

在他们的小手上放什么东西

我12岁时读了鲁迅的《药》，半个世纪后再读，依然感动落泪。这种文质兼美的经典，怎么能把它拿掉？你拿什么取代它？综观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你无法撇开鲁迅。再比如《祝福》和《阿Q正传》，当代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很多，可我总觉得好教师，应该跟学生讲讲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中国人，讲讲祥林嫂和阿Q，那就是最好的教育资源。

一个好的教师可以让学生辨清楚鲁迅作品中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会指出鲁迅的表达状态。如果说鲁迅必须全盘接受，这不是教育，这是灌输。我所在的学校，学生读鲁迅之后有很多疑问跟老师讨论，讨论之后也不做定论，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孩子们还有几十年的人生路要走，教会学生思考，这才是教育。

当然，我也注意到有些学者，包括有些教师对鲁迅有所排斥和抵触，并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比如说鲁迅难懂。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跟应试教育造成的思维水平欠缺有关系。再者就是一些教师自身的阅读经验、社会经验不足，因而在解读鲁迅的时候困难可能多一些。第三点，作品选择有问题，人为造成了阅读困难。

当代人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过去的经典，如果过于以当代的价值尺度衡量历史，也难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我认为人类确实存在公共价值，没有哪个国家的教材是教人学坏。我是上世纪50年代的小学生，红色经典教育了一代人的爱国情怀，让我们到这个年龄依然还有英雄主义情结；但我小时候的教材里充满爱、美、人性、青春、公平、权利意识，使我们营养不良，所以我现在常读童书。

青少年接受教育是有阶段性的。如果某个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很强，老师应该多鼓励他，但如果教师把初一的孩子当研究生教，这种做法显然不合适。大约二十几年前，美国面向小学生征集最聪明的一句话，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句是：“我的手很小，请不要往上放太多东西。”

摘自《南方周末》9月16日 王栋生 文

研究生例行“清退”触发高教深省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拟清退超学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307人，奥运冠军杨威和高崚位列其中。一项网络调查显示，近七成网友力挺校方，认为“学校应该建立严格的淘汰制，否则没法提高质量”。

按照华中科大相关负责人的说法，近年来校方每年都会依规清退各类不合规范的研究生，而且这种做法在其他院校也属平常之事。从媒体报道看，“清退”之所以受人瞩目，直接的原因大概是此次涉及的人数较多，而且具体名单挂于网上，透明度较高。不过，细察学校和民众的反应，可以发现人们对于“清退”的兴趣点在于事实所生出来的、对高等教育进一步提升质量的前景预测和良好期待。此次“清退”并没有制度改革的深层意味。然而，人们偏要将老规定的一次大规模执行解读为高等教育改变现状、提升质量的革新动向。“清退”的意义不仅是按制度办事，更重要的是形成严格的淘汰机制，从而改变高校惯常的“严进宽出”的不利局面，达到教育质量的升级。

人们的关注乃是多年来高等教育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所催生的。从招考环节中存在的诸多弊病到毕业论文的抄袭乱象，从师生配比的失衡到教研质量的下降，类似问题和困境使得高等教育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领域，也使得人们对改革现状、解决问题的心情格外迫切。有了这样的社会背景，有了这样的心理预期，高校的一些实质性动作哪能不引起众人的围观和寄望呢？虽然“清退”之举是一项例行事务，但高校不妨从它的新闻关注度中读出社会期望，进而革故鼎新。

摘自《光明日报》9月10日 钟一苇 文

防止“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庸俗化

如果在“纪念辛亥革命庆典”中附带了太多额外的东西，在社会效果上难免有庸俗化之嫌，从客观上也淡化了有关纪念活动的社会意义。

明年10月辛亥革命将逢100周年。而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场百年庆典“落户权”的争夺战在武汉、广州、南京、中山等热门候选城市之间展开。

作为改变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不言而喻。特别是在当今现实语境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还可以昭示中国人破除历史迷障和隔阂，持续不懈追求国家现代性的努力。但也不免让人感受到地方经济和政绩渴求对于这场重大庆典的驱动力有多大：有争办城市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便公开表示，要为筹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庆典投资2百多亿元，而记者粗略统计发现，最后用于申办辛亥革命百年庆典的直接投入不到4亿元，剩余196亿元投资则搞了城市建设；即使在庆典工程清单内，也有不少项目并非单纯纪念性工程，而属商贸、商业地产类项目。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这种模式下，本来最具品牌价值的人文富藏成了不少地方经济和政绩诉求的幌子，在过度开发的幽暗中面目全非，价值萎缩。近年来，这种对真实人文的非理性开发甚至延伸到了神话、文学等虚拟人物和事件的“故里争夺”上。争夺不是为了人文精神遗产的广泛传播和代际传递，而是为了通过对某一人文产品的主权占有，实现经济和政绩上的跨进。从实质上说，对人文资源的争夺是非物质领域的“圈地运动”，其对于人文精神的杀伤力，需要我们警觉。

因此，对于辛亥革命庆典落户权的争夺，难免不让人感到一些担忧。主办这场庆典的历史意义，完全有可能被现实的巨大利益所遮蔽。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发展的热情值得肯定，但是纪念辛亥革命这样一段严肃的历史，一些地方不计成本地投入到一场庆典的争夺战中，是否有些太不严肃？如果在“纪念辛亥革命庆典”中附带了太多额外的东西，在社会效果上难免有庸俗化之嫌，从客观上也淡化了有关纪念活动的社会意义。当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话题摆到面前之时，实际上，如何纪念也成为了考验地方政府的历史课题。

摘自《新京报》9月17日 徐立凡 文

重视灾后的心灵救援

密集的物质支援相比，这是一片更复杂、更需要经验、耐心去攻克的灾后世界。在中国内地，心理援助被广泛认识、重视和动员，是汶川地震后，“5·12”之后各重灾区的居民安置点，成为了有史以来中国心理支援者最活跃的地方。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还研发了设备，“用于灾区群众治疗心理创伤、恢复心理健康”。这也使重大灾难发生地发生了“心理干扰”现象。很多支援机构或支援者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离开灾区，使需要长期进行的心理援助产生了异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川中学的师生，要填写一批批心理调查问卷，以至出现了

“防火防盗心理咨询师”的现象。

两三年的坚持下，心理救援的团队们已各自累积了一些中国心理救援的本土经验。例如中国式心理援助必须以理论结合当地文化风俗。譬如，玉树地震以后，“做心理工作更需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和信仰。当开始的时候，喇嘛等神职人员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灾民会更相信神”。

“无国界社工会长”陈万联总结说：“很多人问，怎样才能算心理援助是有成效的？第一，是居民对于灾难的情绪反应。第二，他们是否能过上与灾前同样节奏的生活。第三就是薪火相传，当我们离开以后，是否能有当地人可以接上班？”

摘自《南都周刊》第35期 许十文 文

《时代》封面上的阿富汗少女

2009年4月，17岁的阿富汗少女艾莎遭到丈夫的虐待，愤而出走。这是她婚后半年时间里第四次被丈夫打至昏厥。仅仅7个小时之后，她就被婆家捉了回去，并遭到5个月的软禁。丈夫向当地法庭提起诉讼，控告艾莎的出走行为“让整个家族蒙羞”，主审该案的法官是一名塔利班成员，他作出了有罪判决。就在法庭上，艾莎的丈夫亲手用刀割下了她的鼻子和耳朵。

2010年8月的第一个周末，艾莎的照片成为《时代》周刊的当期封面，她用巾遮住了双耳，但人们可以看到在鼻子应该存在的地方，只剩下两个小孔。在被割掉鼻子与双耳之后，艾莎随即被丈夫遗弃在荒无人烟的山区，当地“声援阿富汗妇女组织”(WAW)及时将她救起。《时代》周刊指出，像艾莎这样的遭遇在阿富汗实际上并不罕见。塔利班在1996年时掌握阿富汗政权，他们严格规定女性必须戴面罩，而且没有兄弟或丈夫陪同就不得踏出家门，更不能露出小腿等身体部位，否则将遭鞭刑，连涂指甲油也会被剥除指甲。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当地女性地位终于逐渐提升。

阿富汗政府目前正在实施所谓的和解计划，预计政府和塔利班将交换许多和解条件，人权问题恐因此被极力打压。这让阿富汗妇女纷纷担心自己将是“和平交易”的最大牺牲品。8月3日，艾莎被接到美国接受美容修复手术，也希望借此开展新的生活。编辑理查德·斯滕格尔在解释用艾莎的照片做封面的原因时说：“我们希望让读者正视塔利班对妇女的所作所为。”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支持卡尔扎伊政府跟塔利班和谈。但人们担心阿富汗妇女的权利会因和谈再次遭到屠戮。

摘自《新周刊》第16期 胡尧熙 文

治国艺术与文学洞见

几乎所有经典著作里都可以找到治国艺术的潜在原则。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治国艺术有多种方式。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时随身带着《伊里亚特》。托马斯·莫尔在成为圣徒之前读罗马诗人和剧作家的作品。伊丽莎白一世从西塞罗的著作中汲取修辞艺术和法律策略。腓特烈大帝把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作为君主的典范来研究。

文学洞见为什么对治国艺术至关重要？更具体地说，这两项事业设计的重要问题单靠理性思维解决不了。伟大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尽管不忽视理性思索，却向留心的读者传达国家内部事务或国与国之间事务的混沌方面。简而言之，文学表明，它与治国艺术的关系是相互的。摘自《参考消息》2010年9月15日 查尔斯·希尔 文

词典不死 它们只是不印刷了

历史舞台。

早在10年前，《牛津大词典》便已推出网络版本，用户每年付费240英镑，便可随时在线查阅，而且网络版本不断更新。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每日电讯报》网站上，这篇新闻后面的网络版中，网民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不少人认为《牛津大词典》不再印刷而惋惜，但也有网民表示何种载体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承载的信息不变。诚然，文字还是文字，相比纸质词典，电子版有诸多好处，比如更节省空间，随时随地便于查找等等。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来得容易，去得快”：相比活动两下手指就能轻松获得答案，经过把一本词典从书架上取下，悉心翻阅页面，最后逐行找到这个词语的过程，你会更珍惜劳动所得，希望把这个单词牢牢记住，而不是过眼就忘。

好在牛津出版社表示，普通用户

更加熟悉的同样由该出版社发行的单本《新牛津英语词典》还会继续印刷出版下去，大家也始终能在书店里买到。《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年首次与读者见面，与《牛津大词典》相同，也曾经两次扩充修订，2003年发布了扩充后的第二版。不过，与《牛津大词典》努力加入被人遗忘的历史词条不同，《新牛津英语词典》标榜的是“忠实地记录英语词汇使用的新趋势”。

一边是头部的纸质词典即将被电子词典取代，一边是新词不断被加入到词典中，似乎这都是词典发展的必然趋势。假如你对纸质词典情有独钟，自然可以继续使用下去，至于没能被收入其中的新词，不妨寻求网络的帮助，能被灵活的运用才是词典存在的最大价值，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存在价值，“词典之死”的日子还离我们很远很远。

摘自《外滩画报》9月17日 韦伊 文

今年9月8日的国际扫盲日，加拿大学习研究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关于加拿大成年人文化水平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48%的加拿大成年人(年龄超过16岁)缺乏文化修养。这意味着，他们在阅读、理解、写作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困难，而且这个问题会愈发严重。加拿大学习研究委员会有关人士认为，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加的移民数量导致加拿大成年人文化水平越来越低。

不仅加拿大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低，许多工业发达国家也未能满足现代化城市中公民的教育需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项针对城市居民阅读和电视观看习惯的调查显示，很多西方国家的国民面临“严峻的文化困境”。该调查耗时10年，以应对散文、文件的能力为基准，将文化水平定义为“能否在工作和生活中理解、运用印刷信息”，被称为研究世界文化水平最完整的报告。经合组织教育处负责人约翰·马丁称，在欧洲“至少15%的成年人仅具备相当于最初级的文化水平”，科技发达水平与文化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英国这样的大国也只能排名中下游。

该调查指出，只观看电视而疏于阅读很可能影响成年人的读写能力，从而降低其文化水平。在新西兰、德国和澳大利亚，很多人保持着阅读习惯，60%的人表示每个月会读完一本书，看电视的时间并不多。但是英国人更愿意把业余时间花在看电视上，大部分英国人每天会用多于两个小时的时间观看电视。不过也有例外，在比利时，人均阅读时间和观看电视时间都很少。北欧和东欧则是盛产“书呆子”的地区。尤为让人不安的是，数据显示低阅读技能和高失业率之间存在关联。

据英国《卫报》报道，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输入软件在工作和学习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人们提笔忘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书法艺术可能走向消亡。如果这一代年轻人继续依赖手机、电脑，不仅产生不会书写的问题，同时也会失去阅读能力。

摘自《中国文化报》9月15日 王雨蝶 编译



大学校长演讲的文风问题

早听说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在2010届毕业生典礼上的讲演深得学生和舆论的“拥戴”，最近读到全文，或因期望值过高，反而失望。舆论对讲演的过度吹捧，也恰好反映出长盛不衰的各类“八股”文风对国人文化品味败坏程度之深。我猜李校长对假、空、套话是感到不满的，故也着力追求一种平易的讲话风格。然而，讲演者和听众似乎已丧失足够的敏感——讲稿中的多处排比，其实正是典型的套话；而刻意罗列的大量网络术语，不但在实际上落入了另一窠臼，也显得幼稚和单调，缺乏厚重感。

时下中国已变成一个爱说话的社会，处处听到演说声，且不乏听众。其中不少不是流于溢情，就是过分激情。这很容易惑人视听，但它是通过人的耳目而不是心灵作用于人，无益于社会的稳健成长。事实上，要把平易、庄重、朴素、优雅这些表面上相反的素质凝

于一体，必须依赖理性的说服力和情感的克制力，而这显然已不仅是文风问题。“文如其人”，虽然很容易找出例外，但即便经过特意训练，一个人的内在气质仍会于不自觉中流露，故“文”的危机，仍须从“人”身上找。

惟“人”、“文”之间又是一回环反复的关联。理想气质非凭空而来，又须回到“文”的层面。然而，如今即使号称“文化人”者，也未必有多少时间浸润诗书。互联网时代“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令同侪尤其是后生觉得可爱，就只有亦步亦趋，阅读范围自然是“时文”多而“古文”少。当然不能说“时文”非“文”，有不少人认为上网同样是“读书”。诚然然，但书籍经过时间淘洗，营养也是不一样的。大学乃是社会为一群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创设的“特区”，使他们专力于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研习，至少应在“时文”之外，兼读一点“古文”，才不负美好光阴。师长也应在贴近学生之外，提供更深入的思考和更高妙的品位，方算尽到了职责。

摘自《南方周末》8月26日 王东杰 文

点映不能异化为营销学问

点映最早走进更多公众的视野或始于《无极》。2005年，为搭上“申奥”末班车，《无极》先是小范围地搞了一下点映，记得当时先睹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像极了好莱坞大片”。然而，在公映中，该片却遭舆论与观众极力“炮轰”，成为当年三大导演“申奥”集体翻船的典型代表。

当年凤毛麟角的点映，现如今已经稀松平常；无论影片是大投资还是小投资，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在国内公映前，总会张罗几个熟人、朋友、圈内人士，甚至也包括一些熟识的媒体，小范围地看一下影片，俨然电影公映前的必要程序。

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不论什么影片，每每点映后总是赢得程式化的赞声，但事实却往往令人备感汗颜。一来点映后的溢美之

词并未和影片票房产生“相呼应”，二来舆论与社会对相当一部分影片似乎并未保持对应的热度与好评。如果拿国产影片当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其票房表现也很能印证上述结论。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了48.41亿元，但国产影片票房份额还不及一半。今年6月份的电影市场27部国产影片中，居然高达25部出现了亏损。

点映的叫好声，为什么常常淹没在观众口水的海洋里？到底是观众与点映时观片者的认知存在太大落差，还是因为点映所指的观片者口是心非，或者顺手送个人情，甚至有更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这不得而知，当然也由此导致公众对此进行一些合理性猜测。

有学者曾说：“在当今中国电影界，作为沟通作品和观众、产业和艺术之间桥梁的电影批评，由于

种种原因，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对电影批评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电影批评的土壤分外贫瘠，健康的电影批评生态亟待培育。”的确，批评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缺少这种力量的赞誉之词虽然“温柔”，但也变得十分廉价，也必为观众所不屑。批评生态的培育，显然不能受制于被批评者是否宽宏大量，而是使电影批评逐渐实现学术化、独立化和自由化。

点映仅作为一种请业内人士对影片进行小范围批评指正的方式倒挺好，但如果企图借此左右舆论、抢占制高点，异化为一门营销学问，忽悠观众，久而久之，观众对影片点映后所呈现出的表面盛誉，大抵不太可能表现出什么热情。

摘自《中国文化报》9月17日 余文文

中国慈善事业如何发展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华劝中国富豪捐款的消息迅速火爆各大网站。网民们有人将注意力放在有哪些富豪将被邀请，有人猜测中国富豪们的反应，还有人批评中国富豪缺乏慈善心……

9月6日，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一封致盖茨和巴菲特的信，表示将用“裸捐”作为给“两位先生中国之行的见面礼”。随后爱国者总裁冯军响应“巴比”，也承诺“裸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副教授邓国胜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度逐年提高，而慈善事业发展水平却很低，两者形成强烈反差。在此背景下，公众对富人捐赠有很多期待，希望他们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说，“巴比”中国之行，对中国富人形成了一种善意的压力。“目前逼富人捐款、索捐的舆论并不占主流，大家能比较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慈善事业，这是非常好的促进氛围”。专家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期。

最近，13家公募基金会玉树地震捐款被责令“汇

缴”给青海省人民政府。2008年，演员章子怡公开宣布，通过海外筹款等方式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100万美元，然而今年3月，网络爆出该笔善款实际并未捐出，掀起“诈捐”风波……

邓国胜表示，慈善界的种种现象，恰恰说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型期有两大特征，一是不适应现代慈善发展的制度正在被淘汰，而新制度尚未出台，矛盾多；二是人们对慈善的认识误区多，慈善文化正在逐步形成。”邓国胜说，中国富人掌握大量财富的时间还非常短，无论是财富的积累还是文化的传承，都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开启社会风气，以提高自身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尽管如此，无论从运作模式还是资金规模看，中国的慈善事业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慈善基金会总数不足1800个，而同期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数量已接近10万个；慈善捐款额虽然快速增长，但总量也不过几百亿元人民币，不足美国慈善捐款规模的三十分之一。

中国慈善捐款应由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导？专家认为，目前更重要的是改革中国慈善机制，还慈善事业民间本性。

“‘巴比’中国行，吹的是慈善国际风”。徐永光认为，积极参与慈善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和行动。

摘自《北京日报》9月16日 陈国洲、刘敏文

